

核心话题

各地应以大方县为戒 进行清查整顿

文/梁发苗



作者为财税史学者

中国政府网9月4日发布《关于贵州省毕节市大方县拖欠教师工资补贴挤占挪用教育经费等问题的督查情况通报》，对此，贵州省委决定对大方县政府县长作停职检查处理，对大方县政府分管财政工作的副县长和分管教育工作的副县长作免职处理。

细读通报后的感觉是，大方县简直无法无天，财政违法情况骇人听闻。根据通报，贵州省大方县严重违反了预算法、义务教育法和社会保险法等三项国家法律以及其他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规定：“经人民代表大会批准的预算，非经法定程序，不得调整。各级政府、各部门、各单位的支出必须以经批准的预算为依据，未列入预算的不得支出”，而大方县擅自改变教育专项经费用途，违规挪用上级资金34194万元，主要包括生均公用经费、校舍改造等基础设施资金、改善办学条件等项目工程资金、薄弱学校

改造资金、营养改善计划经费等。大方县挪用经费情况，不但违法，而且也突破了伦理底线，如国家给学生的营养改善计划的钱也不放过。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规定：“用人单位应当自行申报、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非因不可抗力等法定事由不得缓缴、减免”“社会保险基金专款专用，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占或者挪用”，而大方县未按时缴纳教师五险一金，欠缴29930万元。大方县不但欠缴社保费用，还挪用社保费，如通过虚列支出将有关经费从大方县财政局拨入县教育科技局实拨资金银行账户，再通过

一般缴款书回流国库基本账户的方式挪用教师住房公积金15217万元、医保资金8080万元。通过这种乾坤大挪移，将职工缴纳的救命钱挪用于其他方面，简直丧心病狂。

《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规定：“教师的平均工资水平应当不低于当地公务员的平均工资水平”。而在2018年，大方县义务教育阶段教师平均工资水平低于当地公务员800元左右。2019年，教师平均工资水平仍低于当地公务员5000元左右，差距不减反增。2020年上半年，大方县教师平均工资水平仍低于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

除了公然违反国家法律，大方县还违反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拖欠教师绩效工资及各类津补贴18031万元；改变困难学生补助发放渠道，强制未成年学生入社入股，涉及困难学生4.2万多名，导致210多万元困难学生补助被违规截留；大方县还以发放所拖欠的绩效工

资等款项为由，变相强制要求教师存款入股。将违法的手伸向困难学生的补助款，完全突破了起码的道德底线，不知当地负责人何以有如此刚硬的心肠。大方县违反法律范围之大，涉及金额之多，持续时间之长，都是罕见的。莫非大方县看不懂法律的规定，不知道其行为严重违法众多法律法规？

深入解剖和研究大方县的财政收支和违法情况，让人生出更多的担忧。

正如不少人所指出，大方县虽然挪用了教育经费和保险经费，但是并未被贪污，实际上用于别处，可能有难言之隐。从大方县政府官网《大方县2019年十二月财政收支执行情况分析》可知，大方县去年财政总收入33.8846亿元，财政总收入完成68.4493亿元。这样算来，去年大方县的收支缺口达到34.5647亿元。那么，缺口靠什么弥补呢？主要靠来自上级政府的转移支付。去年一般公共预算转移支付达到40.3515亿

元，比当地财政总收入多出很多。看来，这个县主要靠上级政府的转移支付过日子，如果没有转移支付，就根本无法正常运转。另外，数据还显示，截至2019年末，大方县政府债务余额59.7亿元。由此可知，大方县实际上是一个非常穷的县，且债台高筑，还本付息的压力不会小。这种情况下，恐怕挪用各类到手的经费，也是情非得已了。

即使大方县把教育经费和保险资金等挪用了非常需要、非常重要、非常正当的地方，也仍然是违法的。专项转移支付必须专款专用，不得挪用，预算规定了用途的财政资金也不得任意调整，而社会保险资金，如养老钱、救命钱也必须专款专用，决不能任意调剂和统筹。这些都是财政制度的红线，切不可突破。如果为了所谓更加紧要、更加必需的目的而任意调剂和统筹，那么，那些资金量相对巨大而稳定的如上级转移支付的教育

经费和来自参保职工缴纳的社保资金，就可能在各种正当性的名义下被挪用侵吞，教育事业、社保事业将被彻底败坏，下一代的教育和上一代的养老都会落空。

大方县问题尽管严重，但如果仅仅只是大方县一个地方出现这样的问题，倒也不足为虑。但是，它暴露出的问题，总让人觉得并非个案。在地方政府收入低迷，各项开支包括为债务还本付息等居高不下的情况下，柿子挑软的捏，把手伸向教师工资、教育经费和社保资金以解决财政困难，前些年一直是比较普遍而流行的做法，一度成为一些地方的路径依赖。今天，由于疫情和其他因素影响，一些地方经济下滑，出现财政困难，它们是否也会轻车熟路采取同样的办法？这才是最值得关注的。贵州省决定在全省举一反三开展全面清查和整顿，全国各地也应该引以为戒，举一反三，进行清查，不要将小问题酿成大问题。

商业点评

以利益与效率为核心造就外卖骑手“系统之困”

一篇名为《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的报道近日刷屏，文章细致描述了数以百万计的外卖骑手是如何在外卖系统的算法与数据驱使下，周而复始为了完成高峰期蜂拥而至的外卖业务而疲于奔命，但却眼睁睁看着自己的从业收入从最初入行的月入过万到如今逐步下降，这也成为外卖骑手普遍的生存境遇写照。

外卖正成为当下国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尤其是在一二线城市，忙碌的上班族需要通过外卖，快速解决自己的三餐需求。相比于传统的到店消费，外卖业务以其更加丰富多样的餐饮店菜品供应、更为方便的就餐形式而受到欢迎。

不过，外卖的出现本质上是现代商业生活效率至上主义的产物。美团、饿了么等外卖平台出现，正是瞄准了这一市场所带来的巨大发展空间。尤其是通过商家地推、用户价格战等实现了对市场的教育，从而带动了一代年轻消费者的需求，以及合作商家的不断增加，也与网约车、

文/毕柯



作者为财经评论员

共享单车一起，构成了中国移动互联网经济的新大陆。

经过多年发展，美团已经成为市值2000亿美元的超大规模企业，饿了么也代表着阿里巴巴本地生活战略的核心支撑。对于外卖平台而言，在多年投入之后，目前已经到了逐步收割B端（商家）和C端（用户）的阶段。美团之前对合作商家佣金标准的提高，一度引发了激烈矛盾，由此可以看出，随着行业集中度不断提升，现存两大外卖平台尤其是美团逐步掌握了市场主导权，从而对供应端（商家、快递骑手）和需求端（用户）形成了博弈的强势地位，无论有多少不满，绝大多数商家、快递骑手乃至用户也只能选择其服务。

以此作为基础，外卖平台打造了以利益与效率为核心的资源控制及调配平台。正如报道所指出的，外卖平台通过算法和数据，不断助推每个外卖骑手所分摊的外卖订单数量峰值攀高，这一方面可以更好消化高峰期井喷的订单需求，另一方面以相对更低的人力成本完成更多的订单量，不仅能够为外卖平台的交易额提升带来重要助力，也通过这一服务能力对内增强合作商家黏性——离开平台去另一家平台，就得不到这么多订单，对外构建竞争护城河，以更高人均产出获得更大市场份额。

在这个由平台、合作商家、外卖骑手和用户共同构成的商业模式中，外卖骑手无疑是最为弱势的。用户是商业模式的利润产出根本，合作商家负责提供用户选择平台的要素——餐食，平台通过连接最大数量的商家与用户，获得更多交易额，带来更多佣金，上市后形成业绩、股价的循环上涨，进而可以将从外卖业务获取的资金及融资用于其他新兴产业扩展。

而外卖骑手一度被称“收入超过小白领”，但坦率而言，骑手们所从事的是简单、重复、低附加值的工作，最大的付出是时间和身体，收入模式依赖于所完成的订单量，这种工作模式与20年前“三来一补”工厂里流水线的工人并无两样。

这就造成了外卖骑手职业准入的低门槛，基本只要身体健康的人都能加入，相比于其他一些蓝领职业，外卖骑手的整体收入相对还是要更高些，这又决定了众多中低端技能劳动者愿意选择这一职业。如此一来，对于外卖平台而言，外卖骑手不愁“用工荒”。

因此，对于外卖骑手的绩效考核指标日趋严格，成为外卖平台的必然选择。设置用户对外卖骑手服务质量的单方面评价，并以此对外卖骑手进行处罚，看似不太合理，但外卖平台损失一个用户所付出的代价远大于一个外卖骑手辞职。毕竟，在已经上市的美团财报中，活跃用户数、客单价等由客户决定的指标是投资市场对美团成长性的重

要评价标准，而投资平台不会关注外卖平台的外卖骑手数量增加了多少，恰恰与之相反，在财报口径中，外卖骑手数量越来越指向成本指标。

这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外卖平台要在高峰期，将看似无法承受的订单指派给外卖骑手，为什么当客户对外卖骑手做出不公正的评价，外卖平台要处罚骑手，为什么明明有些商家服务质量同样不理想，但外卖平台却不会采取同样严格的管理标准。一切都来自于外卖平台的另一种数据和算法——合作商家数据、新增及活跃用户数据，决定了外卖平台的业绩和市值，尽最大可能对外卖骑手进行压榨式的产出考核，则让外卖平台实现更有效的成本控制。

或许，这也是对互联网新经济神话的某种反讽。当外卖等新兴互联网业态出现，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带来了市场供应效率的提升，成本的下降，但相关技术和商业创新收益，在外卖平台、商家、用户、外卖骑手身上是递减的。外卖平台成为

市值万亿元的巨头，大量商家获得新增订单业务，用户无需再外出就餐，有了更多的休息及其他可支配时间，外卖骑手获得了新的就业岗位，但收入随从业人数增加以及外卖平台的抽成增加而减少。

再精巧的算法设计，一旦进入到以利益与效率为核心的商业系统，带来的是产业链条不断加速的运转，外卖骑手作为终端服务一环，承受最大的压力是可以预见的结果。而要改善这一现状，需要外卖平台适度降低外卖骑手高峰期的业务送达指标，对合作商家服务质量的同步提升做出更有效的解决方案，给予外卖骑手遭遇个别客户不公正评价时有通畅的维权渠道，这不仅要靠平台自律，也需要更多的外部力量介入。比如有关劳动部门对外卖骑手缺乏合理权益保障的关注和行动，工会等组织代表外卖骑手与外卖平台进行更对等的沟通谈判，等等。唯有如此，外卖骑手才不会面对强大的平台系统无力博弈，只能继续缺少权益外衣的“裸奔”。

国际观察

美国大选拨动军政关系

文/孙兴杰



作者为吉林大学公共外交学院副院长

《大西洋月刊》的一篇报道引爆了美国军政关系，总统特朗普到底有没有羞辱美国的阵亡军人？这个问题不但让特朗普斥骂一些媒体是“假新闻”，而且爆粗口。在大选之前，这样的消息无异于是对特朗普发动的突然袭击，让特朗普一下子处于道德伦理与政治的下风口，挖了特朗普与共和党之间的墙脚，让特朗普变得非常“不共和党”。已故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说，“军政关系的一个基本要点就是军官集团同国家之间的关系”。军政关系是一个国家内部结构的核心，特朗普虽然是三军统帅，但是也要尊重一个职业化的军官集团，尤其是在大选之前，特朗普必须要维护这一“根本关系”，毕竟军人也是一个非常庞大的选民群体。

《大西洋月刊》的总编辑杰弗里·戈德伯格爆料说，2018年特朗普访问法国的时候，取消了访问法国的埃纳·马恩公墓行程，这一公墓中有“一战”期间阵亡的美国士兵的遗骸，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他怕在风雨中乱了发型，而且对美国阵亡军人非常不屑，认为他们是一堆“傻瓜”和

“倒霉蛋”。文章发出来之后，赚取了足够多的流量，拜登也没有放弃这样的机会，他说，如果报道属实的话，那么就大错特错了，简直是耻辱。拜登还不忘补刀，称根据特朗普以往的话来说，这十有八九是真的。2018年特朗普访问法国的时候，的确是取消了访问埃纳·马恩公墓行程，当时媒体也有报道，原因是天气不好，不利于美国直升机降落，所以为了特朗普的安全就取消了日程，至于说是不是怕风雨弄乱了特朗普的发型，不得而知。《大西洋月刊》的报道据说是从四位消息人士那里得来的，也许是特朗普身边的人，也可能是被他炒了鱿鱼的人。因天气原因而取消致敬美国阵亡军人的行程，尚可理解，如果对阵亡军人出言不逊，那特朗普可能就玩大了。

特朗普是三军统帅，但需要得到军人的拥戴和支持，美国虽然是文官掌军，但是也要尊重军官集团的专业化和自主性。美国其实是一个尚武的国家，军人总统不在少数，经历过战场洗礼的总统自然在军中有威望，而逃兵役的总统就像身上有了污点一样，没有军事常识的总统也会成为笑柄，比如小布什曾拿望远镜。特朗普是不是“羞辱”了美国阵亡士兵，难以证实，但是这件事情影响巨大，以至于第一夫人第一时间出面“辟谣”，国防部长埃斯珀向媒体表示，特朗普总统对我们国家的军人、退伍军人和家属抱有最高的敬意和尊重，至于说特朗普有没有羞辱军人，埃斯珀并不知情，那时他还不是防长。

特朗普为了弥合与军人之间的关系，宣布会继续向军报《星条旗》提供经费，此前，国防部已经决定不再提供经费。特朗普在推特上说，在我的眼皮底下，美国政府不会削减《星条旗》的经费，它将继续成为我们伟大军队最好的信息来源。特朗普的这一推特只是为了表明，没有人比我对美国军队更尊重，这是

“懂王”的逻辑。

第一夫人以及内阁高官都出来为特朗普辩解，这足以说明军政关系其实是特朗普连任与否的重要一环。在最近一段时间的种族运动中，尤其是越来越极端的“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使得特朗普获得了美国警察的支持，人心思稳，特朗普引用尼克松的口号“法律与秩序”就越有价值。《大西洋月刊》的报道把特朗普在共和党全国

大会之后形成的乐观气氛破坏了，8月两党全国大会之后，特朗普的支持率上升，连任的前景越来越明朗。《大西洋月刊》的报道让特朗普大动肝火，更上火的是美国股市接连大跌，有人说，这是美国资本市场的“暴动”，因为华尔街的大佬不喜欢特朗普。这种说法也是言过其实了，在国家政治的框架之下，资本的力量是有限的。

特朗普与五角大楼的关系不

睦，已经不是秘密了，也有传言说，特朗普要解雇现任防长埃斯珀，但是在选举之前“换将”，影响不好。特朗普抨击军方的高层就想着战争，其实是批评艾森豪威尔当年说的那个军工利益集团。问题的关键在于，艾森豪威尔是美军的“英雄”，诺曼底登陆战役的司令，军中威望颇高，他批评军工利益集团，没有什么问题，况且是在快卸任的时候。

下转 E4

海淀区质量月活动启动 发布“企业质量提升伙伴计划”

为更好聚焦企业需求，服务企业高质量发展，近日，海淀区举办2020年“质量月”活动启动仪式暨“企业质量提升伙伴计划”发布会，海淀区质量提升工作领导小组现场发布了“企业质量提升伙伴计划”，着眼于企业质量管理现状，聚焦企业“质量提升”，与各企业结成“质量提升成长伙伴”，助力企业修炼“内功”，提高市场竞争力。

据悉，伙伴计划内容主要为开展引航行动，提升企业质量意识；开展护航行动，助力企业纾困解难；开展领航行动，发挥示范引领效应。

据介绍，“企业质量提升伙伴计划”将以中关村科学城北区重点企业以及智能消费品生产企业为重点服务对象，支持100家企业深入开展质量提升行动，通过免费培训、咨询等形式，为企业提供有针对性的质量管理服务，引导各企业强化质量意识、风险意识，提升整体质量水平，凸显质量效益。其中：开展重点企业质量诊断40家；开展质量管理风险研究40家；培育北京市政府质量管理奖梯队企业15家；开展首席质量官试点5家。

全国质量月期间，海淀区还将围绕“建设质量强国 决胜全面小康”主题，开展缺陷产品召回、质量安全进企业进社区进校园、有机产品认证宣传和汽车三包主题宣传系列活动，深入普及质量安全知识，提升质量意识，营造“政府重视质量、企业追求质量、社会崇尚质量、人人关注质量”的浓厚氛围。

